

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

作者简介：

汪毅夫先生，1950年3月出生，台湾台南人，历任上山下乡人员、邮递员、学员、教员、研究员、公务员和退休人员。学术著作有《闽台区域社会研究》等18部，300余万字。



鲁迅的小说名篇《阿Q正传》里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“本不是大村镇”的未庄，却也见过“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，锣声镗镗地报到村里来”的情形，知道“夫文童者，将来恐怕要变秀才也”“状元不也是‘第一个’么”的道理，听说“皇帝已经停了考，不要秀才和举人了”“举人老爷到乡下来避难了”的消息，有过“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冤屈”的时候，他在“秀才赵大爷”家做工、也曾“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”，还有把“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”的“革命”计划。如鲁迅所写，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。

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。

明代嘉靖二十四年(1545年)勒石的泉州《青阳乡约记》里说：“夫乡之有约，古也。而约正之名，委重于士类，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。”乡约制度，古已有之。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，但不是乡规民约。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、自约、互约的自治制度、自治组织，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(又称约首、总理等)，“为小民平户婚、田土、斗殴、赌盗一切小事”，“不但果决是非，而以劝民为善”。在闽南乡土社会，自泉州太守王方南(名士俊)始。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，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

改为“士类”即有科举功名之人。据《青阳乡约记》，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“年未三十联魁科第”“其为约正”也，年仅30余岁。他是明嘉靖八年(1529年)进士，属于“士类”即有科举功名之人。明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勒石的南安《乡约社学记》也说，南安各乡之乡约也“择乡之庠士秀而有文者，使摄其役”，如“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，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”摄乡约之役。由于“士类”或有非“年高”者如庄用宾，清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，李光地特地在《丁酉还朝临时公约》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：“约正于旅行虽卑幼，然既秉乡政，主持公道。自后乡邻曲直，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，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，则为从公讯实，覆命尊长劝惩之。其余年少未经事者，虽分为叔行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，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，颠倒是非，以坏民俗。”李光地本人也是“士类”，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《临时公约》。在台湾，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，有科举功名之人是“地方的指导者，具有相当势力”。

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，在闽南民俗、民谚和民间文学作品里也有留存。例如闽南中秋“博状元饼”的节庆习俗，就是对科举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。饼分一秀、二举、四进、三红、对堂和状元，一一对应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探花(一甲第3名进士)、榜眼(一甲第2名进士)和状元(一甲第1名进士)。中秋博饼，取的是“秋闹夺元之兆”，乾隆《台湾府志》记：“是夜，士子递为宴饮赏月，制大饼名为中秋饼，朱书元字，掷四红夺之，取秋闹夺元之兆。”实际上，不仅读书人，其他人也热衷参加博饼以取“秋闹夺元之兆”，因为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各成员也是开放和公平的。闽南民谚“秀才人情纸一张”(自作字画送人是秀才的交际方式，喻君子之交或世态炎凉也)、“秀才讲人话，举人打官腔”(秀才不失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，举人可以是官员或准官员)、“一名透京城”(入京中进士一举成名)、“米街土地公，头顶戴官帽”(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、施士洁父子进

士，是当地荣耀)等，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举制度相关。至于闽南民间文学作品，容我举《畅所欲言》为例。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用闽南“俗语缀成”、闽南“老嫗能解”的奇书，收文21种，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897-1907年，曾在泉、厦、漳、台流传。《畅所欲言》一再语涉科举制度，尤其是科举罢废后的社会情形，如“自停科、岁，无教书，无用功”“无考校，又无处转(赚)食，十分枯燥”“科举一废，书房兄改途趁食，有个学命卜，有个学山医，各人行各路”等。涉笔成趣，是精彩的“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”讲义。(汪毅夫)



▲福州三坊七巷的台湾会馆内展示的一张皇榜。(韩惠彬/摄)

螺洲『帝封江』之战追溯

地名承载着地方的历史与文化，往往有其渊源。在福州螺洲古镇旁边、乌龙江畔有个叫“帝封江”的地方，它默默地见证了宋元那场叱咤风云的战役，如今在史学家及当地热心人士的挖掘考证下，这段历史逐步浮出水面，有关事迹逐渐清晰。

南宋恭宗德祐元年(1275年)，元兵南下迫近都城临安(今杭州)，朝廷称臣求和不成，各地守臣纷纷降元。据陈遵统《福建编年史》记载，德祐二年(1276年)正月，文天祥请求派赵昱、赵昺二王“出镇闽广，以图兴复，俱不许”。至元兵迫近临安城外，赵氏宗亲又请，朝廷才听从。二年二月，进封吉王赵昱为益王，判福州；封其弟赵昺为广王，判泉州。

不久，临安沦陷，谢太后携宋幼帝赵昺降元。元兵进逼临安城东北时，驸马都尉杨镇和前任福建观察使杨亮节等，急奉二王出城，渡浙江南下，杨镇嘱咐杨亮节等保护二王继续南行，自己则北行以就死地，希图以此迟滞追兵。

公元1276年赵昱一行乘众多战船携官廷金银财宝由水路入闽抵福州，在仓山濂浦闽江边的绍(邵)岐古渡口上岸，驻扎在“平山福地”行官中(后为避嫌，改称“泰山宫”)，大臣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、陈文龙、陈宜忠、杨亮杰等文武百官先后抵达福州，设福州为

陪都七个月之久。

公元1276年6月14日，在众臣的拥护下，杨太后携8岁的益王赵昱于福州鼓楼“垂拱殿”顺利登基，史称宋端宗皇帝，福州改称福安府，仓山濂浦设“帝王行宫”。众臣簇拥赵昱皇帝，重整军威，一时军心民心大振，再图收复南宋江山。同时有陈文龙、李庭芝等忠臣部署战船在螺洲店前村螺江、义序浦口村、尚干、龙祥岛、阳岐、淘江、白龙江、南屿、双龙村一带江面上驻防。阳岐村陈文龙庙(史传原是陈文龙府)与潘墩文天祥庙均有古迹可鉴。

公元1277年，福鼎、宁德沦陷，元将张弘率军大举压境福安府。螺洲风云，叱咤五虎。宋军由张世杰、李庭芝、吴楚材等令水军封锁乌龙江与螺江支流口，宜避风良港，攻守退自如，各战船连排用铁链锁紧作堵塞线，厚涂淤泥防火攻。此战是关系到少帝与宋军江山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，时逢江水潮涨，宋军为避敌锋芒，故令龙祥岛岸北先锋战船悬挂御旗，并擂鼓引诱元军顺潮而上，元军不知是计，急令战船顺流追击，两军遂至上游大樟溪，南通乡方庄古村落水岸一带激烈厮杀，古称风骨十八挡古墓群还留点史迹。

史称两军战至乌龙江退潮，元军部分战船搁浅沙滩，宋军勇猛诛杀，场面惨烈。这场

宋元大战后来被文史学者称为“帝封江”宋元之战。

文天祥、陆秀夫等文武百官同时携少帝趁势撤离濂浦，兵分两路择道城门山边路与黄山刘厝里的龙潭井取水出海备用。行经螺洲杜园村古渡口边的庙宇，由杨太后携少帝与弟赵昺进庙求香祈安后，在渡口环龙港登船。国舅杨亮杰率领财宝船队，提早就抵达此处迎接少帝，危急时刻幸得螺洲乡民与蛋民引导，经方岐洲、城门州、义江与龙江驶出乌龙江主航道。与潜伏在龙祥岛岸南的一千多艘主力战船，于三江口汇合后成功撤离，驶往泉州。民间为感念这段历史，保护少帝的撤离成功，各古村落纷纷将其所经历之地与河名，分别改称为龙角街、龙过井环龙港、龙江、乌龙江、龙祥岛、白龙江、龙安寺、双龙村等保留至今。

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教授等学者对宋元“帝封江”之战给予很大关注，曾多次奔赴林浦、方庄等村落开展系列调研，并将相关挖掘考证史料撰文发表。螺洲陈氏乡贤收集相关资料后，历时9年，出资数百万元创建螺洲帝封江历史文化展厅。近日，重达6吨多的“帝封江宋元之战史迹碑”在文化展厅展出。

(木子)